

访大卫哈维：今日乌托邦，明日的现实

黄孙权

来源：heterotopias 2015-10-25 10:20

问：你最近的一本书《希望的空间》（*Spaces of Hope*）与你之前的作品不太一样，这本书似乎较为温暖、善意，并充满教诲式的启发？能否谈谈此种转变？

Harvey：你知道每本书都有不同目标与读者，我尝试以不同的写作吸引更多的读者，让读者瞭解政治经济学的必要，也希望让读者能够透过这些书来明白“阅读资本”[2]在当今的意义。你若看我以前的作品，我其实也尝试过以不同的风格来写作。这也是一个历史转变的过程，有时这样写，有时那样写，或者混合起来。有趣的是，我想，像《资本的限制》（*The Limits of Capital*）这样的书是某种看穿柔软世界、真实活动、日常生活、以及人们不自觉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的一种途径。当然，读者有许多种，我必须要有方法让政治经济学之必要与一个会参观伦敦博物馆的学生发生关系，所以试着用另一种方法来写作。我也随时可以回到《资本的限制》的那种风格，相信我，非常容易，我马上可以。



▲电影《分歧者》剧照

问：对而我言，似乎不只是写作风格的问题，似乎也代表了某种学院里左派的共同处境？

Harvey：的确。很明显的，在北美，或者说英语的知识、学术圈里，我们非常流行说“文化转向”（*culture turn*）….

问：你恨“文化转向”吧？

Harvey：是的。人人都会说政治经济学无用，是旧传统，应该搞点文化研究吧。

我不是完全不赞同文化研究，我也受过其影响，以及生产相关的研究，例如我对巴黎的长期历史研究[3]，同样是处理当时巴黎人的文化与政治生活。我想做的是将两者合起来，当有人说这是文化，是现代，我同意，但同时也是政治经济的，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想将人们从“纯文化”研究拉回来，带点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我想让人们理解到，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想、如何做的根本。

问：另一个有趣的事，在你的书中，你提到不同世代对你的课的反应，在台湾刚好也许相反。在解严之前，许多学生对马克思、毛主义充满了禁忌的热情，现在随处可得了，念毛泽东与马克思作品的反而少了。现在的学生对于文化转向的研究也特别热情，同时在社会运动的表现上，也较为“后”现代了，充满了欢乐、嘉年华式的形式与热情。如台湾的无壳蜗牛运动，以及英国现在的 raver 们争取路权的运动，你的看法如何？

Harvey：列宁有句评语：“革命是人民的嘉年华。”这些活动是重要的，一开始是重要的，对于广泛的政治召唤来说是重要的。我对你的回答是，如果没有后面的东西出来，那只是作为某种焦虑的释出，然后又回归正轨。所以问题不在是否有用，而是运动的人能否认认真思考他们如何能愈来愈壮大？机会的确在这里，在 90 年代后，人们可以用各种形式去对抗政府，表达他们的不愿意，我不是反对这种形式，街头政治仍是当代政治重要的一环，我也参加其中，然我关心的还是，然后要怎么做？去哪儿？

问：你比较喜欢“现代”的抗议形式？现有的抗议形式都很“后”现代呢？

Harvey：我不确定这是“后”还是“前”现代。政治示威都很高科技的，现代的示威方式很多时候是很后现代的。

问：我们知道在西雅图那场著名的抗议全球化运动中呈现的景象。对峙的两方，一方是警察，一方是古典形式上的抗议者，而在抗议者后面，则是数以千计的 raver 在后头唱歌跳舞？

Harvey：要讨论抗议的形式，让我们回到 60 年代，看看当时的反战运动领导者之一的大卫·霍夫曼（David Hoffman）在美国警察前面开枪，然后枪上开出一面美国国旗，这还不够后现代吗？嘉年华的面向（carnival side）很重要。回到更久以前，如 1848 年的巴黎革命，也是一个嘉年华式的运动，那时有个传统，住在巴黎中区的工人，或住在周围的工人们，礼拜天会出城越墙在同一区喝酒，当喝完酒走回城中时，真是吵闹。当他们一同走回城中，就是一个工人重返城市的嘉年华，他们重新占据了城市中的空间。1848 年的革命正是工人组织起来，占领城市，如同 1871 的巴黎人民公社革命一般。我的重点是，正如列宁所说的，嘉年华是革命的酵素，从街头唤起人们，以节庆的方式组织培力他们。但西雅图抗争那次的形式，我认为也许过于象征化了，那次的确特别，但非真的行动。在六

零、七零、八零年代也有许多类似的形式，都是一样的。这种欢乐的形式一直维持。

问：在台湾的菲律宾外劳，礼拜天聚会的唱歌念诗当然可以说是排遣愤怒焦虑，让隔日更容易回到工作，但这些聚会也的确让他们更团结、更壮大，不只是嘉年华而已？

Harvey: 如果全球化一点来看，他们在星期天的聚会讨论在工作中如何被剥削，交换经验，这些与全球化力量有关。全球力量控制了空间，也就控制了地方，如果全球化控制了空间，也就摧毁地方可行的创意，这些事情一再发生。你看巴黎公社的革命，也是控制地方，然后是空间，发展出一种非常具有革命视野的概念。政府是非常担心的，所以才会采取屠杀，真的是屠杀，有 2、3 万人被杀。空间的转变与网络对革命是重要的，展现了其限制与机会。我同意你的观察，这是非常有用的活力、有力的情感表达动员，但我也很焦虑，也是我所担心的。我担心这些都会变成控制剥削的一部份，如 1960 的学生运动，和 90 年之后的洛杉矶种族暴动，我不觉得之后社会结构会有巨大的转变，洛杉矶的非裔人士状况会变好。

问：在东亚，也许内部殖民的问题更显的重要。例如台湾与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劳动力剥削的问题？一种解答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重提“国家的左手”的提议，特别是他对欧盟国家平均工资水平的提议，你的看法与策略如何？特别是在区域国家的层次上。

Harvey: 全球化就我的观点而言，就是地理上的不均衡发展。全球化真是坏，坏的原因是一切又回到以前。我有兴趣的策略是改变全球化的语言，以殖民主义、军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区域的不均衡发展等说法来取代全球化，这也就是我要处理的，也是政治介入的可能性。对你所说的问题，必须面对东亚之间的内部政治的复杂，台湾的商人全球做生意真是问题，有些更糟的例子例如韩国人到越南、瓜地马拉的作为，台湾的商业行为与中国的关系又很复杂，这些对政治而言都有极大的空间，对国家的结盟与地位就很重要。例如新加坡，这个区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非常重要，中国的发展是焦点，但现在看来非常负面。如何将在地议题，例如菲律宾外劳的问题连结到区域、全东亚国家的层次是要很努力的。我知道韩国有些帮助穷人的住宅计画就是针对菲律宾的外劳，这是很具区域性的政治行动，我不知道如何产生的，但开始发生了。欧盟也开始了某些计画，有些非常进步，但欧盟内部的反动势力，地方新纳粹的问题一样严重。在这个时刻，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行动。上海的地方城镇与企业也在大锅饭破产后负责照顾下岗工人，付起社会责任（厂办社会），同样的上海有许多发展也很悲观，但世界上新自由主义无处不在，你必须面对。

问：区域性国家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Harvey: 那要看何种政治提议？

问：如像布尔迪厄说的，在东亚区域国家内订定一定的工资水平？

Harvey: 那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听起来像乌托邦，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设想，那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但对我来说，第一个共产党破产于 1840 年的巴黎，之后所有共产主义都是破产的，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做共产主义。但有一个很好的说法是，今日乌托邦，明日的现实（today utopia planning, tomorrow going real），因此我必须回头与乌托邦之理想合作。

问：这就是希望所在。

Harvey: 是的，这就是希望。

问：你为何选择要当一个地理学家？什么让你从实证主义的经济地理转向政治经济以及左派的地理学家？

Harvey: 我曾写了一长篇交代了此一问题，我会送你一份。

问：那说些精彩的部分好了？

Harvey: 年轻的时候，我就想离家，老想往外跑，与我的幻想一起。其次，当时大英帝国还“存在”，我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人都是属于我的，我的集邮簿有许多地方邮票上都有皇冠的标志，如萨尔瓦多、印度、非洲的许多地方，我认为我就是帝国，帝国的一部份。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问：最后，谈谈对你的批评？

Harvey: 我有批评，天啊，怎么可能？！我怎么都不知道（大笑）。

问：就是你从来不谈性别、性倾向、种族问题而老是以阶级观点出发？也许你讨厌的文化转向也是部分的原因？

Harvey: 我不喜欢讨论性别议题的时候，好像就与阶级无关。分析种族问题时，好像不需要提到阶级。的确，阶级分析是有限制的，但是每种研究都有其限制，我也从其他领域里学到很多。有人问我，我可以写本女性主义的《资本的限制》，那是不可能的。我与其他人有非常大的对话空间。说我是个白人、欧洲中心，那我还能多说什么？一个有趣的对话经验是我与美国巴特摩市非裔人士一起工作时，我们常常互相批判、讨论，有一次我对他们说，你们到底想要我怎么样？他们说：让路。我说：不行，你们一定要与我协商，就好像我要与你们协商一样。你不能叫人们让路给你的。